

# 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和可信性

## ——谈谈中华文明的几个特点（上）

单霁翔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重视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逐渐达成了共识。下面我就讲讲中华文明的几个基本特点。

### 中华文明的原生性

中华文明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的一支原生文明。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考古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渐揭示出中华远古历史在我国大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至少在100万年前，人类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活动。比如重庆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云南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蓝田公王岭和湖北郧县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也都接近或早于100万年。近几年发现的一些遗址，有的也可能接近200万年。从上述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等“猿人”，到广东韶关马坝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古人”，再到北京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等“新人”，三个阶段构成原始人类时期。根据考古成果研究，我国稻作农业文化可推进到1万年前。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1万年以前祖先的生活方式。经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发展，中华文明经历了从起源到逐步形成的过程，社会的复杂化程度更加明显。夏、商、周时期逐渐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再经过秦、汉及

其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中华文明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夏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他们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科研究成果所证明。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北方地区，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南方地区，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地区，发现了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等。这些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特征。



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彩陶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红山文化 玉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中华文明的可信性

我国古代文献中，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期，把夏代作为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作为历史依据，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但《史记》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很难据此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真正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种种疑虑，仅仅依靠古代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近50年来，我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在名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了用考古学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需要着重探索三种标志性遗存，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中心的城市、文字、冶炼金属，被称为“文明三要素”。一是关于城市。我国已经发现不少古代城址，其中较大规模的城址至少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出现。如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

城遗址，始建距今都已超过6000年。而更多的古代城址，出现于稍晚的龙山时代，地点分布更为广阔。二是关于文字。我国发现最早的古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这是完备而成熟的文字。在商代之前仰韶时期与龙山时期的陶器上，都发现有许许多多刻画的符号，特别是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出现的一些符号，普遍认为与文字有关。大汶口文化有符号的陶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良渚文化陶器上和玉器上的文字，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300年。三是关于冶炼金属。在我国出现很早，如在陕西姜寨遗址发现的半圆形黄铜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在甘肃林家遗址发现的小铜刀，属于马家窑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早在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就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主要活动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在河南豫西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经过近50年来对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近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纵横交错的道路，大型宫殿建筑遗迹，青铜器冶铸、烧陶、制骨等工作坊址和各类墓葬，出土了高等级的青铜礼器、玉器及各类陶器等，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王权形成。1928年，我国学术机构首次组织对殷墟的发掘，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的商王朝的存在，更使《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载内容成为信史。殷墟出土的15余万片甲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我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这对3000年以来的我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至今仍为世界上1/4的人口所使用。在冶炼金属方面，殷墟是出土商代铜器最多的遗址，总数约6000件，其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创造文明成果的技术手段是独有的，也充分证明了中华远古文明的可信性，并为最终形成更为完整、系统的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 开栏的话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标志。本版从今日起开设“汉字故事”专栏，讲述汉字背后的文化密码和演变故事。这些故事，与现实中华文字的应用紧密相连，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字的文化内涵，规范地使用汉字。让我们一起踏上汉字的寻根之旅。

### □ 汉字故事

## 知否？知否？ 我姓“木易杨”

杨立新

本人姓杨。从识字起，小学老师就告诉我：你姓“木易杨”。此后我一直深信不疑，当别人问起“贵姓”时，我就以此作答，对方也不以为怪。直至上大学时，才知道自己足足被骗了10余年！那是在古代汉语课上，老师告诉我们，繁体字“楊”的右边为“易”，读yáng。原来“杨（楊）”为形声字，“木”为形旁，“易”为声旁，不能拆分为“木+易”。岂止我呢，相信许多人包括一些杨姓公民还都蒙在鼓里。“木易杨”的始作俑者，可能出自京剧《四郎探母》。《四郎探母》讲的是北宋杨家将的故事，四郎杨延辉在金沙灘一战被俘后隐姓埋名，“将杨字拆木易匹配良缘”（京剧《四郎探母》唱词），辽国萧太后以铁镜公主招他为婿，称为“木易驸马”。无独有偶，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第九回，杨康的父亲杨铁心，在金兵劫虏后大难不死，遂隐姓埋名，化名为“穆易”。文中称：“他不敢再用杨铁心之名，把‘杨’字拆开，改‘木’为‘穆’，变名穆易。”看来，文史大家金庸千虑一失，在这里也出现了不应有的疏漏。为了弄清“杨”字，我们首先要区分“易”和“易”，在字源上对它们进行一番探析。

“易”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体

𠄎 𠄎 易 易

关于“易”，《说文解字》释为：“蜥易，蜥蜴，守宫也，象形。《秘书》曰：日月为易，象会易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羊益切）”许慎认为，“易”是蜥蜴形体的象形；《秘书》一书则认为“日月为易”，为会意字。

“易”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体

𠄎 𠄎 易 易

关于“易”，《说文解字》释为：“开也。从日、一、勿。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强者众貌。（与章切）”唐颜师古注曰：“易，古阳字。”清段玉裁注曰：“易，此阴阳正字也。阴阳行而会易废矣。”可见，“易”是“日、一、勿”组成的会意字，为阳（陽）的古字。看来，“易”和“易”，虽然仅差日下一横，却是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由古到今，都不能相混使用。我们再回到“杨”字。关于“杨（楊）”，《说文解字》释为：“木也。从木，易声。（与章切）”由《说文解字》我们知道，“杨”是从木、易声的形声字。从反切音（见链接）可知，“杨”“易”二字均为“与章切”，可见“杨”从“易”得声当无疑义；而“易”为“羊益切”，与“易”“杨”二字声韵均隔。因此，关于“杨”姓，正确的说法应是：木易杨。

### 链接

反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汉字注音方法。其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字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如“杨”的读音，可以取“与”字的声母“y”，和“章”字的韵母“ang”拼合而成，使用反切法注音就是“与章切”。

“易字族”汉字 (读 y á ng 或韵母为 ang)	扬(揚)、场(場)、杨(楊)、肠(腸)、汤(湯)、飷(餼)、汤(湯)、汤(湯)、汤(湯)、汤(湯)、汤(湯)、汤(湯)、汤(湯)、汤(湯)、汤(湯)、汤(湯)
“易字族”汉字 (读 y i 或韵母为 i)	锡(錫)、蜴(蜴)、惕(惕)、埸(埸)、惕(惕)、駮(駮)

### □ 中国最美古村

## 井陘于家村：能工巧匠书写石头文章

王锦强 文/图

绵延起伏的太行山脉横亘着八条咽喉要道，素称太行八陉。山之东麓的井陘县山环水绕，系“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其土地虽贫瘠，文脉却甚为豁达。盘踞太行山深处的各色人等可谓藏龙卧虎，数不清的能工巧匠仿佛带着神来之笔，浑身都是使不尽的智慧和本领，尤其把石头文章做得风生水起。而微水镇于家村，显然是一个石头书写的村落民居文化

遗产样本。明朝成化年间，诗人于谦的后人迁于此。那大大小小的石头开始走上台面，石头村的故事便从此演绎。

于家栖息的地方四面环山，北高南低，西俯东仰，有一种“不到村口不见村”的高深莫测。于家村周围山体是天然的屏障，依山而建的房屋以石头为主料和框架结构基础，部分辅以砖木结构，呈现出粗中带雅、朴实壮观的视觉效果。

石头村东西500多米长，南北300多米宽。村内六街七巷十八胡同弯弯曲曲，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填充着上下

固本抱团的顽强与历史担当；鹅卵石路面起起伏伏，依高就低，熔古铸今，串接了多少英雄正气的底气和铮铮铁骨。

石头村的古街巷、古民居、古庙宇、古戏台、古桥梁、古驿道以及古井、古树等，犹如成串的珠玉，散发着古朴的艺术气息。这些蕴含传统文化精髓和深刻营造理念的乡村建筑，体现了就地取材的生活生产经验、代际传承的工匠技艺和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理想，成为太行山区村落民居的代表作和活态的民俗文化博物馆。

于家村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建筑如清凉阁、观音阁、真武庙、大王庙、白庙、岳飞庙、戏台等，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and 布局形式。街巷空间格局和石窑合院以石经纬，顺其自然。

于家古村镶嵌于山峦、丘陵、河谷、川壑之间的地理特点，默契和吻合了太行山区的自然脉络和肌理构造，体现出传统天人合一的理想外向型空间结构关系与长幼有序依存和谐的内在环境氛围营造法则。

于家村内石头房屋最受居民厚待。石头房屋成本低

廉，而且左右逢源，俯拾皆是。石头材质的隔热性能，解决了山区四季温差变化过大的弊端。在通风和采光上，避免了地面过潮的建筑缺憾。石材的朴素色调，形成石头房屋的统一风格和面貌，也便于力量和意志的凝聚。

坚硬的石头是太行山的精髓，也是山里人毅力的证物。村内石楼石阁、石街石巷、石门石屋、石墙石壁、石阶石凳、石碑石刻、石磨石碾、石槽石臼、石桥石栏，犹如天然的石头博物馆，天工开物，不拘一格，斑驳陆离，岁月留痕。

村内石雕，美轮美奂，寓意吉祥。石雕供桌、佛莲花宝座、佛龛、拱券、字画、门墩、隐峰勾石、碑刻、石狮子等，既表现出工匠们丰富的知识、卓越的境界和良苦用心，也为子孙后代接受传统教育和学习工艺技术，留下了多元立体的形象教科书与实物参照。那镌刻



于家门楣匾额上的“根深叶茂”“默会万真”“耕读传家”等字样，有礼制教育的传递与衔接，也彰显石头村有人成长的本质意蕴。其先祖于谦“重名节，重成仁，重社稷”的思想基因在这里依稀可寻。这是于家村也是广大太行山人奉行的不变天理和王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于家人在大山里打撈着祖先身后淤于失落的记忆。